

为了解陈赓大将,笔者曾先后采访过尤太忠、陈康、邓逸凡、龙飞虎等将军,他们都是陈赓大将的老部下,获得了珍贵的资料。

陈赓将军气质豪放,乐观幽默,无拘无束。1943年夏某日,毛主席于延安作报告,陈赓将军忽抓耳挠腮,东张西望,后整衣起立,直奔主席台。毛主席一愣,问:“陈赓同志,有何急事?”将军不语,取毛主席搪瓷杯,“咕咚咕咚”喝之。而后,擦嘴、敬礼、报告,说:“天太热,借主席一口水。现在没事了!”在场干部哄堂大笑,毛主席亦微微笑。

1937年10月,日军猛攻娘子关,企图迂回包抄太原。国民党军第三军千余人被围困于旧关。为牵制日军,陈赓将军遵刘伯承师长之命,率三八六旅前出七亘村侧击日军后勤线。七亘村位于平定、昔阳、井陘三县交界,四面环山,路窄谷深。

陈赓大将:七亘重叠设伏兵

——开国将军抗战录

吴东峰

村下就是一条由井陘至平定的必经小道。这条小道穿越狭窄的底谷,谷深数十米,底宽不到三米。战前,刘伯承视察七亘村,看了四周地形,高兴地陈赓说:“这里左右无处隐蔽,首尾难以相顾,是个理想的伏击之地。”刘伯承当即决定在此设伏打击日军后勤部队,并把伏击日军后勤部队的任务交给了陈赓的三八六旅。

10月26日,日军300余人押送大批后勤物资大摇大摆走进七亘村伏击圈,陈赓将军一声令下,埋伏在四周的772团以手榴弹、机枪袭击,最后以白刃战打败日军。此战歼灭日军第二十二师团辎重部队,毙伤日军300余人,缴获骡马300余匹和大批军

用物资。

两天后,刘伯承又命令陈赓在同一地点——七亘村再打一战。当时有人怀疑,同一地点再打一仗,敌人还会来吗?而陈赓则心领神会与伏击部队指挥员分析:“日军对前次小小的失利会忽略不计的,因为他们更在意在山西的赫赫战果。”

果然不出陈赓所料。10月28日,陈赓再次指挥部队在七亘村打了一场伏击战,战果依然,歼日军百余人,缴获骡马数十匹。陈赓将军后来回忆此战写道:“敌20师团之后卫辎重部队被我两次伏击,缴获甚多,井陘至平定敌之交通已完全受阻。”

七亘村伏击战打破了兵家“用兵不复”的教条。刘伯承总

结:“兵无常势,水无常形”,陈赓的执行力是关键。而陈赓将军回忆说:“七亘村伏击之所以能在同一地域同一战法成功伏击同一日军,归功于刘帅的机动灵活的作战思想和掌握先机的战场洞察力。”

战史称,1938年3月,侵华日军出动3万以上兵力,对晋东南进行九路围攻,史称“晋东南1938战役”,陈赓将军率三八六旅协同其他部队,连续发动神头岭伏击战、响堂铺伏击战、长乐村追击战等,前后共歼日军4000余人。日军十分憎恨陈赓部队,并在坦克上写上了“专打386旅”标识。

龙飞虎将军与笔者言,陈赓将军战时很严厉,平时很幽默。抗日战争时期,陈赓受命到延安参加会议,见龙飞虎,说:“小鬼,我又来吃小米了。”三天会议结束后,再见龙飞虎,说:“小鬼,我不吃小米了,小米不好吃,我还是去吃大米。”其意为毛泽东决定其率部去打大仗。

丰子恺是那种你一定知道,但又极容易错过的艺术家,因为他的创作,往往日常到你很难会郑重地审视它,但仔细一想,又发现自己曾无法避免地被它作品中的某一个瞬间治愈,发出过会心的笑声。

最近在上海展出的“人生短 艺术长——丰子恺艺术展”,较为完整地呈现了丰子恺的一生,能让人清晰地理解丰子恺关于自己的描述:“最喜小中能见大,还求弦外有余音”。

“以小见大”,不只是丰子恺的艺术审美观,亦是他人的人生信条。丰子恺始终以虔诚谦卑的徒弟心态遵从弘一法师,此为一小;他始终爱着家人,用一颗童心抵御生活的困境,此为二小;他心怀悲悯,坚信万物有灵,哪怕是一只蚂蚁,此为三小;而他从中

找到了人生的方向,创作的灵感,坚定的信念,此为大者。正是这“以小见大”,让丰子恺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人,更在日常与无

丰子恺的“以小见大”

韩垒

常的变幻中,以己知彼,知常达变。这值得被每一个在时代的颠簸中前行的人珍视。

丰子恺生性善感,年轻时在浙一师范求学遇到了老师李叔同。一日夜晚,李叔同对他说,在众多的学生中,他从未遇见过像丰子恺一样,画画的进步如此之快的。稀松平常的一个晚上,就这样成为了丰子恺人生的决定性时刻。现在我们已经很少提“师从”,可丰子恺却在数十年的时间里,始终遵循着李叔同的足迹,虔诚而坚定。1918年,李叔同在杭

州出家,法号弘一,10年后,丰子恺为弘一法师的50岁大寿,筹划《护生画集》。第一集出版后,弘一法师嘱托丰子恺每十年为其画一集,60岁画60幅,70岁画70幅,以此类推。丰子恺回复:“世所期许,定当遵嘱”,意思是只要还活着,就一定完成任务。

1942年弘一法师在福建圆寂,丰子恺一诺千金,一直画到了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。

《护生画集》“护生即护心”,以悲悯之心看待生灵与杀戮。第二集出版于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,画作没有直面战争,反而较之第一集更加优美静谧。这些反映日常的“小情小调”遭到了人们的批评,但只有懂他的人知道,描述深藏的美丽自然和真善的人间,让大家看到生活还有希望和生机,以非战文字(艺术),为世间人留一线生机。这是何等的“大”。

日本侵华时期,丰子恺筹备着另一册《漫画日本侵华史》。创作半途,日本人的炸弹轰炸到了家乡石门湾,丰子恺带着一家老小连夜逃离。船只离开河埠头时,看着没画完的漫画书,他十分揪心。丰子恺的小女儿丰一吟回忆,父亲说我是画书的不要紧,但不能连累家人,于是就把书丢河里了。放在宏大叙事之中,这也许显

阅览室里的「度」

高汉良

夏日炎炎,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的阅览室里环境优雅,宽敞明亮,空调驱赶炎热,凉风引来四邻八舍的居民。老人在这里静静阅读书报,孩子在这里完成暑假作业。然而,优雅的环境里也有不和谐的“音符”——有人长时间占座,离开阅览室或回家吃饭、做家务也不让出座位,在座椅、桌面上放置茶具、书包和一些杂物,似乎是在“告诉”别人:此座有人!我要回来的!

夏令高峰中,笔者常去的阅读室的空座比例常达二至三成之多,但不少人因为找不到座位,只能拿着书报站着阅读,或是悄悄离场。社区阅览室本是公共资源,独占座位的人,是否也应换位思考一下呢?日常生活中,许多事都应该有个“度”,不要忘了尺度、丢了风度。

得不那么“英勇”,但恐怕又是每一个普通人都会做的选择。逃亡途中,丰子恺心情苦闷,小儿子瞻瞻却说,喜欢逃亡,因为逃亡就是和爸爸妈妈一起旅游。孩童说的话,给了丰子恺动力,他索性就把逃亡的过程当作一次旅行,并用漫画的方式记录了下来。丰子恺说,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:天上的神明与星辰,人间的艺术与儿童。

我们常常把艺术家想象成或冷峻、或热烈地深刻理解人性和世界的人,却很少意识到,当一个人坦诚、自在甚至谦卑地表达所思所想时,就已经是一种弥足珍贵的艺术家表达了。“以小见大”,是把艺术和生活拉回到人的层面,是不以人为工具,而以人为目的的智慧。只有

“小”,能给予人们永恒的希望与能量,走向心目中的“大”。

展览中展示了不少丰子恺与孩子往来的书信。其中一封,丰子恺和儿子玩起了填字游戏,让人忍俊不禁,这老头,真逗!

选定的路

赵葳

冷气混着各种气味在人群中钻缝。我被夹在车门边,正对着一个穿蓝色T恤的小胖哥,他手里攥着手机,山东口音像刚蒸好的馒头,热乎又实在。

小胖哥在打电话,他嗓门压得很低,尾音却带着点倔强,“我很纠结,留在北京,父母年事已高;回老家吧,我总觉得不得劲。你知道不?在北京挤地铁,早上一个小时,人挤人跟打仗似的,可那节奏是我自己的。今天想早下班吃碗面,明天想加个班赶项目,都由我。”

列车进了站,报站声混着人流涌动。他往旁边挪了挪,继续说:“前阵子回老家办事,结果特别不巧的是设备维修,搁北京速度,半天搞不定。结果在老家,人家说‘明天再说吧’‘师傅今天不在’,硬生生耗了个周末,多请了一天的假才弄完。你说急人不?”

他挠了挠头,语气软下来:“同学聚会更意思,以前光着屁股玩的兄弟,现在开口不是打麻将就是娃的奶粉。我插不上话,他们也不关心我在北京的快节奏,只问我啥时候结婚生娃。好像我这些年在北平的日子,成了另一个世界的事。”车厢晃了晃,有人撞了他一下,他笑着摆摆手,继续说:“我妈总说老家安逸,还不用吃外卖。可那种安逸,一眼能望到头。三十岁看到五十岁的样子,我不知道能不能适应。”

“但你说留在北京吧,房租涨,通勤累,有时候加班到半夜,看着空荡荡的地铁站,也会问自己图啥,”他对着手机叹口气,“回去怕适应不了别人的节奏,留下又怕扛不住生活的重量。你说人这辈子,咋选都有遗憾呢?”地铁到站,门开了,人潮推着他往外走。他边走边说:“可能人生哪有啥标准答案,选了就往狂奔呗”,声音渐渐被淹没在人群里。

其实哪有什么“不如”,不过是两种人生的权重不同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奔驰,有人奔向小镇的炊烟,有人奔向都市的灯火。或许重要的不是选哪条路,而是在选定的路上,把日子过成自己的节奏。

真正认识一个人,有的说最好一起去旅游,也有的说最好到他家里看看。人在自己家里是相对放松的,举手投足,逐帧映射出人品镜像。还有居家的环境、装饰,一架书橱,一台冰箱,坦诚地展示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。家,是一段能轻易流露出来的故事。

相互串门,自古以来是很平常的社交。孟浩然的朋友煨好鸡肉,煮好黄米饭,邀请他来家中做客,由此诞生了一首千古名篇《过故人庄》。《三国志》里,周瑜去孙策家串门,孙策打猎去了,周瑜直接入内拜见孙母吴夫人,说明周孙彼此已成至亲。汪曾祺文中昆明人家的堂屋八仙桌,沈从文笔下湘西吊脚楼火塘,都是人来客往的集散地。我们小时候,弄堂人家的门很少是关着的,屋里往往是三代人共居,一桌一床两长凳,左邻右舍随意串门,来人还特别喜欢坐在床沿,床单上被压出的一条条褶皱,是烙在我们岁月中的印记。

然而一扇门毕竟是一道设防。《礼记·曲礼》有记:“将上堂,声必扬”,明代《客座赘语》也记载了一些官员因频繁拜会,而遭同僚弹劾的事。刘震云在《一句顶一万句》写牛爱国串门引出是非,从中可以体会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。20世纪70年代,我曾在一家工厂任团支部书记,每年春节团干部照例去家访,家访通常是不打招呼的,被访者一般也热情接待。但有一次的走访,令我们有点尴尬,那位青工一言不发,眼中分明流露出冷淡。若干年后回想起那眼神,我才醒悟到,她是在抵御我们的贸然闯入。串门也是一种需要契约的社交仪式。不速之客打乱的不仅是宁静的闲暇,更是人们悉心维护的心理边界。

曾几何时,“花径不曾缘客扫,蓬门今始为君开”,如今我们正走向另一极端。牛皮沙发上难见亲朋好友的身影,枝形吊灯下的欢声笑语渐渐消散。电梯遇见搬来多年的邻居,微笑始终停留在“你好”和“再见”的刻度之间,彼此从不跨越邻舍的门槛。和朋友相约,喜欢选择茶坊、餐厅、咖啡馆。客厅无客,时尚的年轻人已将客厅改为茶室、琴房、游戏场等。有一项社区调研显示,75后平均每月串门3.5次,90后骤降至0.8次,00后的社交半径,更多的是在游戏地图和直播弹幕间延伸。

康德说:“人既不能忍受他们的邻居,却更不能忍受失去他们。”人是天生的群居动物,人们需要社交,边界感只是契约之外的拒绝。敦煌文书《邻里往来书仪》,其中有一句“适闻贵室新添弄瓦之喜,欲备芹献,未审尊意”,恍如今人微信里的招呼“在吗?我打算……”,是一种穿越千年的文明传承。我一老友阿仁好客,他说中国人有独特的生活哲学:寒露时分当围炉夜话,惊蛰节气宜走亲访友。他不时呼朋唤友去他家,客厅里的茶几上常备着正山小种、六安瓜片,一顿神聊海吹,不亦乐乎。据说日本近年兴起的“玄关咖啡”,借鉴古罗马人在中庭设置接待客厅与私密室的过渡空间,在门

前半米处设座奉茶,恰如建筑学家说的“第三空间”,如此会客厅,可谓天造地设。

我一记者朋友去艺术家姚慕双家采访,石库门前楼应是光线亮堂,但姚家却用窗帘遮挡了一排木窗。同去的摄影者欲拍照,说“光线太暗”,刚要拉窗帘,姚慕双说了一声“勿要拉开来”,接着不紧不慢地说:“阿拉是唱滑稽的,对面人家晒台太近,每天就像坐了第一排看白戏,所以屋里窗帘要拉拉好。”老弄堂房子间隔距离过近,彼此伸手可及,难以保持隐私。姚慕双伸手将窗帘拉开些许,阳光从布缝里漏进来,在地板上织成细密的光斑。他笑道,如果像周柏春一样,乔迁到美琪大戏院对面的高楼里,倒用勿着拉窗帘了。门窗阻隔了陌生,关闭可以守护私密和宁静;而窗帘是一种遮掩,一种柔性的婉拒。“隔帘湖上月,对酒眼中人”,人来人往,相约可期,展示的是一幅带有文明留白,也有温情浓彩的现实主义意象图画。

肖振华

可以去你家吗



七夕会

暑假里,为了不让青春期儿子嫌弃,我有时会选“假上班”,提着电脑包去我的后花园咖啡馆写文章。

“后花园咖啡馆”是我给它起的名字,因为它在我家小区的后马路上,不沿街,在一个酒店的停车场里,可以说藏得相当好。我第一次发现它的时候有点惊喜,心想它怎么能开在这里呢?后花园咖啡馆的名字其实是对台湾夫妻,到上海20多年了,之前在周庄开酒吧,七八年前搬到这里开咖啡馆,店里所有的事都亲力亲为。10年前,我们全家有过一次环台湾岛自由行,这时候记忆就衔

来就选定的,有台灯、有插座,还有一束小小的康乃馨,可以直视外面的小花园,很完美!我喜欢这个工位。中午就是简餐,三五十元的台式小吃,撒梅粉的炸鸡块和煮得软烂

我的后花园咖啡馆

王慧兰

的米线是我的最爱。老板娘亲自下厨,端上来时还会带一句“趁热吃”。

文章写累了,就去花园里走一圈,伸伸腰、看看花、撸撸猫,也可以和老板老板娘聊天。他们是一对台湾夫妻,到上海20多年了,之前在周庄开酒吧,七八年前搬到这里开咖啡馆,店里所有的事都亲力亲为。10年前,我们全家有过一次环台湾岛自由行,这时候记忆就衔

接上了。台北士林夜市、九份老街、淡水小镇、花莲牛肉面……老板夫妇每次都能聊到我的心坎上。去多了,发现也有和我一样“假上班”的人。有个男人坐我身后,他一般10点多来,点一壶茶,中午也不吃饭。两台电脑+手机+耳机,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的,有时去院子里抽支烟……通常,我走的时候,他还没“下班”。还有个坐角落的男人,一杯美式撑一整天。中午他会消失,下午两点再回来,估摸着是出去觅食吧。

5点,我整理电脑包走人,跟老板娘老板娘打招呼。老板娘会礼貌相送,帮我拉门,我说:“谢谢。”他说:“辛苦了。”我喜欢这样的咖啡馆。人与人之间的相处,终究还是有点温度的。

时尚

